

## 第一章 近代货币的演变

中国货币文化渊源流长，早在夏商时代，贝就成为货币而流通于世，并在春秋战国时创立了颇具特色的青铜货币文化，刀币、布币、圜钱和蚁鼻钱构成了这一时期货币的主导。自秦始皇统一货币形制于天圆地方的半两钱，至唐代。以半两、五铢为代表的纪重方孔圆钱构成了中国货币文化的主流。唐朝以后纪重钱被极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年号方孔圆钱所取代，宋代白银和纸币又开始在货币领域中显露头角。明代以铜钱加上银两配合政府纸币的中国货币体系，犹如三驾马车在中国货币流通领域中驰骋，至 1840 年以前，这种情形没有多大的变化。

古代亚洲文明中心之一的中国，其货币文化对东方货币，特别是亚洲货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人类货币文化中，有两枝流芳百世的奇葩。一个是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货币文化，它曾经影响了亚洲许多国家的货币文化千余年，一个是古希腊的货币文化，它是西方货币文化的发源地。

从货币形制上来说，中国的古代钱币注重于文字，以书法美蕴藏于钱币的方圆之中；而古希腊货币则以图案见长，神像、英雄人物、动物和植物构成了货币的主图案。

中国钱币自秦半两钱以来，其形状一般为方孔圆形，人们戏称为孔方兄。一开始，钱币是计重的，如秦代的半两、汉代的五铢。但自唐代以后，年号钱开始占优势，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文化对亚洲国家货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亚洲许多国家的铸币从形制、重量、文字，甚至名称也与中国钱币基本一致，它们一般也为圆形方孔，使用汉

字，名称叫“通宝”、“元宝”。日本早在奈良天皇和铜元年（708年，唐景龙二年）就铸造汉文的“和同开珍”钱；朝鲜在成宗十五年（996年，宋至道二年）开始仿铸中国的“乾元重宝”钱；琉球秦久王于公元1453年（明景泰四年）铸造汉文“大世通宝”钱。越南在公元九七〇年（宋开宝三年）开铸汉文“太平兴宝”钱。一直到近代，这些国家仍铸造类似于中国钱币的汉字货币在国内流通。

其次是完全仿铸中国的古代钱币，在其国内使用。在古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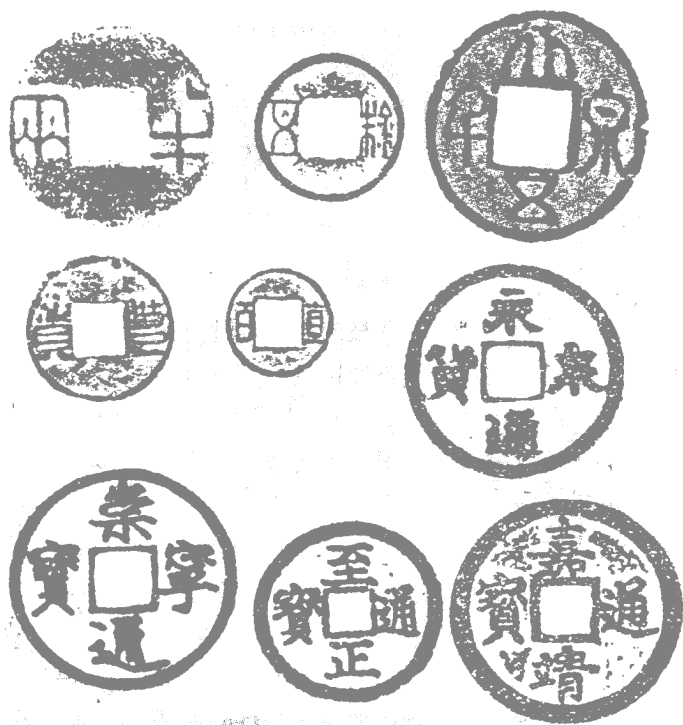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古代钱币



图 1-2 西欧古代钱币

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交往中，中国钱币作为友好使者曾广布亚洲，如日本曾仿铸中国“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 36 种年号钱；越南仿铸了 14 种，朝鲜也曾仿铸唐代钱币。最近印度尼西亚出土了一批铅钱，这些钱币均为仿铸的中国古代唐、宋年号钱。

第三是亚洲许多国家的钱币使用汉文，并且与中国古代钱币一样，刻意追求钱币上文字的书法美，以此来表现出钱币的美感。如琉球国龙字铜币，如果没有极佳的汉字书法艺术的修养，那活龙活现的龙字是不可能写出来的。近年来，泰国也发现了铸有汉字的金币。

第四是亚洲许多国家的钱币继承了中国钱币的一些传统。中国古代货币常在钱背铸有文字，以此表明铸地、铸时；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钱币也在钱背上加铸文字，如朝鲜在一六七八年始铸的“常平通宝”，日本在 1625 年始铸的“宽永通宝”等等。

古代中国与亚洲诸国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许多国家与中国贸易时所需的商品竟然是中国的钱币。日本在明代时多次派官至中国贸易，要求中国给以铜币。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略》一书中称：“爪哇、旧港、锡兰均用中国钱”。西沙群岛出土的大量明代钱币，就是当时郑和下西洋的遗留之物。同时，许多亚洲国家的汉字钱币，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流入中国，并混杂在中国钱币中流通。这些钱币最多的是日本的“宽永通宝”、朝鲜的“常平通宝”和越南的“兴中通宝”、“景盛通宝”等等。

中国近代货币极为复杂自 1840 年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以来，中国近代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 1840 年—1886 年。这一时期是人们泛称为清代近似于银铜平行本位制的崩溃时期，原来的制钱和银两平行流通的局面，随着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再加上国内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外忧内困，财政吃紧，咸丰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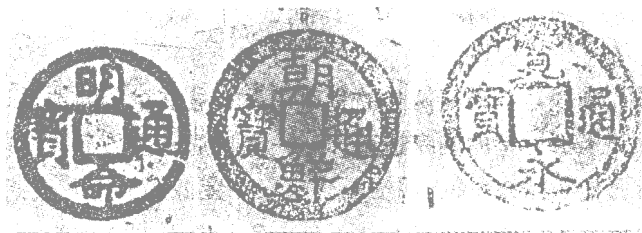


图 1-3 受中国货币文化影响的亚洲钱币

大钱、宝钞、官票将古老的银钱平行体系破坏无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内外贸易的增长及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使货币本身的发展日趋挣脱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牢笼，而逐步走向近代化。1886年清政府开始用机器铸钱，由于机器铸钱产生了清政府意想不到的铜元和银元势力的飞涨，因而这一年可定为清末币制发生大变革的开端，同时在这一阶段，私票作为货币种类中的一员也颇引人注目。

第二个阶段是 1886 年—1935 年。晚清督抚们政经大权独揽的局面，在经济特别是在财政和货币上已为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货币的极度混乱打下了基础，并呈现出两个发展趋势。其一是货币封建性日强，另外即殖民地色彩日浓。但 1931 年的废两改元和随之而来的 1935 年的法币改革，则标志着中国货币极具时代性的近代化的完成。这一时期多元本位的银两、银元、制钱、铜元及代表这些硬通货的不同发行机构的纸币极度泛滥，而法币改革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影响、复合的最后产物。而这一时期作为沿纳私票传统又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影响的中国商业银行纸币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轨迹，则更具有研究的意义。

## 第一节 制钱

方孔圆钱，在明清两代的货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中央户部和工部主持的国家造币厂——宝泉局和宝源局，自明朝创始而与清代相始终，关于明清两代宝泉和宝源局铸币及流通情况，先贤论述较多，而对明清两代另外一支极重要的货币生产部门地方造币厂及其铸币流通情况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我们以清代地方铸钱为对象，来说明清代制钱的一些基本情况。

铸钱是封建政权所掌握的重要经济杠杆。清朝沿纳了明代在中央和地方分设铸局的传统，自顺治元年始，在中央设立了分由工部、户部掌管的宝泉和宝源局，并在各地恢复原明代铸局，又设立了一批新的地方铸局。这种中央和地方分设铸局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宣统年间。

### 一、清代地方铸局的设立及铸币用途

有清一代先后在全省设立的地方铸局计有：直隶有宣府钱局、密镇钱局、蓟镇钱局、宝直局、宝德局。山西有大同府局、宝晋局、阳和钱局。奉天有盛京钱局、宝奉局。吉林有宝吉局。江苏有江宁府局（宝宁、宝安局）、宝苏局。浙江有宝浙局。福建有宝福局、漳州局。江西有宝昌局。山东有临清镇局、宝济局（宝东局）、莱州局。河南有宝河局。湖北有宝武局、荆州府局、襄阳钱局、郟阳钱局。湖南有常德府局、宝南局。广东有宝广局、肇庆府局。广西有宝桂局。四川有宝川局、宁远府局。贵州有宝黔局（贵阳府局）毕节县局、大定府局。云南有宝云局、大理府局、禄丰县局、蒙自县局、临安府局、霁益州局、东川府局、广西州局、东川府新局、顺宁府局、永昌府局、曲靖府局、楚雄钱局、广南钱局、宁台厂钱局、文山县局。西藏有宝藏局。陕西有延绥钱局、

宝陕局。甘肃有巩昌府局、宝巩局、宁夏府局。新疆有叶尔羌局、阿克苏局、乌什局、库车局、喀什噶尔局、宝迪局、宝伊局。台湾有宝台局。

这些铸局除西藏宝藏局因地方习惯用银而开铸诸如“乾隆宝藏”等银币外，余均开铸方孔园形的制钱，其中南疆地区铸造红钱。许多铸局在咸丰年间铸造过大钱。

清代地方铸局很少一直铸造而未停歇，开设的年代也不相同，大体上顺治年间有 25 个铸局，康熙年间增至 30 个，雍正年间存铸局 18，到乾隆年间又增至 32 个，嘉庆年间存 24 个，道光年间仅剩 19 个，咸丰年间又扩至 29 个，同治时降为 18 个，光绪年间又恢复到了 26 个，清末宣统年间仅存了 3 个<sup>②</sup>。

清代中央的造币机关——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是清政府所倚重的两大造币机构。它自顺治元年开设以来就广设炉座，顺治初年两局初建时，宝泉局有炉 100 座，宝源局设炉 50 座<sup>③</sup>。且连续铸造，基本上没有间断，宝泉局一直到宣统年间还维持着。

宝泉局铸钱“专为搭放兵饷之用”，宝源局铸钱“专为给发工价之需。”<sup>④</sup>此外二局还负责北京及附近地区的货币供应，平衡银钱价格。而在各地的驻军兵饷、用工俸役、官俸、驿站杂支以及地方的货币供应，平衡地方钱价，甚至支援其它无铸局省份钱币，这些任务都落在地方铸局的身上。因而从铸钱规模上说，各省铸局合计起来，有时要大大超过中央的户工两局。

清初时，户工两局铸币有“户部铸二、工部铸一”的定例。康熙六十年，两局铸币为 673920 串，雍正十二年为 602687 串<sup>⑤</sup>，十

据《清朝文献通考》、《续清朝文献通考》及各省省志资料。

同上引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 48《户部钱法》第 1 页及《工部钱法》第 30 页。

唐与昆：《制钱通考》卷 2，第 1 页。

⑤ 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 129，工部鼓铸，第 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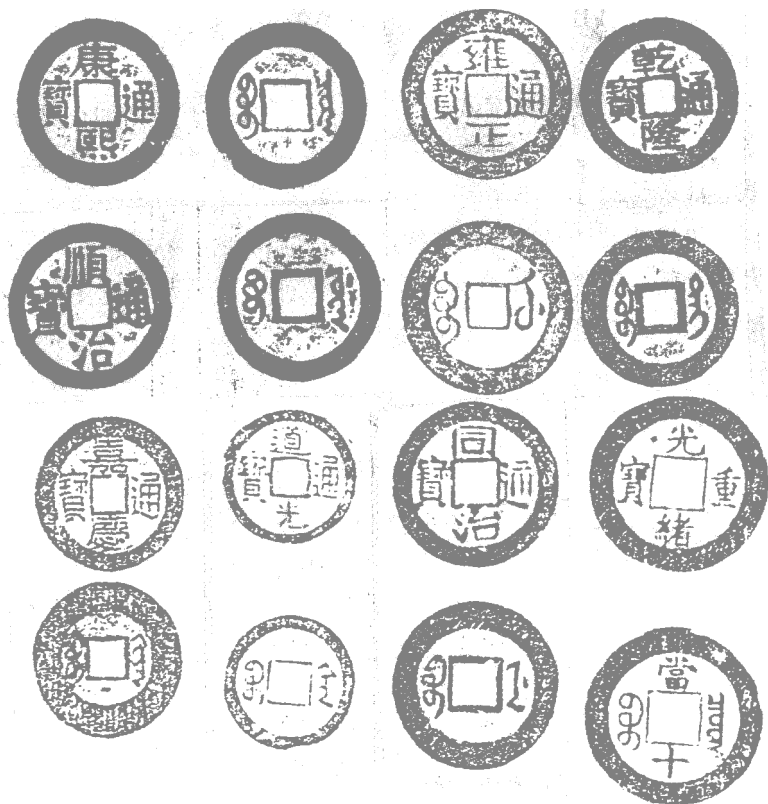


图 1-4 清代制钱

九世纪后为一百万串以上。而雍正十二年仅云南一省铸钱计达 5.8 亿枚，已超过中央两局的铸造额<sup>①</sup>。乾隆末年后，省局常年的生产额为 1146269.523 串<sup>②</sup>，与户工两局的铸额基本相同，足见地

<sup>①</sup>《云南历史货币》，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 页。

<sup>②</sup>《铜政便览》（抄本），卷 5 上，各省局每卯铸数。

方铸局地位之重要。

清代地方铸钱的目地主要有以下几项；

### 1. 搭放兵饷

铸钱搭放兵饷一直是清代省局铸钱的重要任务，顺治年间各省镇铸钱几乎全部用于搭放兵饷。以后随着军事活动的减少，省局铸钱的用途加宽，但各地驻军的兵饷在很大成份上仍由地方铸钱解决。如康熙二十一年，云南方定，驻兵甚多，故而广开铸局铸钱搭放兵饷。又如乾隆二十一年四川宝川局铸钱的主要用途有：搭支文武职养廉、兵饷、官俸、操练番屯所需等等。

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起义，清廷财政困难，各地铸大钱主要是为了支付军费。此外，各地官俸有时也由地方铸局铸钱解决。

### 2. 工俸

支付工俸是地方铸局扩大铸造的一大原因。清代地方大型工程的工俸有时也靠地方铸局铸钱解决。如乾隆十七年湖北增炉铸造制钱获息后以支付修砌岸费用，乾隆十八年因修城墙而加卯鼓铸。云南于乾隆六年在东川府旧局设炉 20 座，年铸钱 89773 串以供疏浚金沙江水道给发工钱<sup>②</sup>。乾隆三十二年，云南省城和临安府加铸，以铸钱利润拨发铜矿工程费用。有时还用铸钱余息作为铜价上涨的补贴，如乾隆三十年云南加卯鼓铸以余息作为汤丹、大豫两铜厂加增铜价之需。

### 3. 维持流通

彭泽益先生在评论户、工两部铸钱时认为：清代十七世纪 40 年代和 70 年代前，清政府铸钱不仅是维持币制的手段，同时又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且其实质主要在后者。而 70 年代后，由于铜价日增，铸本日重，铸钱营利（铸息）性质逐渐减弱以至消失，

<sup>②</sup>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7），顺治年间制钱的鼓铸，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 16 页。

<sup>③</sup> 《续云南通志稿》卷 49，食货志，钱法。

其后铸钱虽仍保持着一定规模的经常性生产，主要是迫于维持钱法。清代地方铸钱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而且有时让其他铸局代铸钱币运往钱币缺乏的省份流通。如雍正四年运云南钱至四川、湖广、广西等省流通。乾隆五十一年将宝泉局新制钱运至湖南行使<sup>②</sup>。

但更多的时候是将甲地的钱币运往乙地充作兵饷，而后加以流通的。如顺治初年因广西未加铸，而由云南加铸后运桂搭放兵饷流通。雍正四年云南省城、临安二局以钱 4 万串发湖广等省搭放兵饷流通<sup>④</sup>。乾隆二十四年因平定回疆，经理屯田需钱而让四川、湖广等地钱局加铸“按数分运协济”<sup>⑤</sup>。道光元年因南疆平定张格尔叛乱需饷，而让北疆伊犁宝伊局仿阿克苏局钱铸造，运往南疆行使<sup>⑥</sup>。

#### 4. 平钱价

清代货币制度是银钱并用，清初定为钱一千文合银一两。当钱价过高时，各地铸局则加铸制钱，低价出易。反之，钱贱则停铸。如乾隆十二年，湖北宝武局因湖广钱贵，故铸钱后减价出易以平市价<sup>⑦</sup>。

有时甲地为乙地代铸钱币，一方面为解决该地的流通问题，有时也是为了平定钱价。如康熙四十四年，云南以钱运至四川，以平四川钱价。乾隆年间，因台湾钱贵，福建则开局铸钱运台以平定钱价。

① 彭泽益：清代宝泉宝源局与铸钱工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湖南通志》卷 57，食货三，钱法。

《广西通志》卷 52，经政略 28，彭铸。

《湖北通志》卷 52，经政志 10，钱法。

《皇朝通志》卷 89，食货略 9，钱币。

⑥ 《清宣宗实录》卷 108，道光元年十月癸酉。

⑦ 《湖北通志》卷 52，经政志 10，钱法。

## 5. 为中央政府代铸

地方铸局为中央政府代铸的情况，史料记载仅见两例，一是雍正时，云南广西府设炉 94 座铸钱，钱成后运京行使。一是咸丰时宝泉局在山西平定州设宝泉分局铸铁钱，后归山西地方管理。

## 6. 特殊用途

地方铸局钱币除以上几个投放渠道外，有时还有特殊用途。如乾隆十五年，“令江浙二省钱局加铜鼓铸，时以明年辛未春，圣驾巡幸江浙，正商民云集之时，特命截留滇铜于江苏浙江二局，预行加卯开铸，届期设立官局，减价出易，以平市价”。<sup>③</sup>

## 二、清代地方铸钱的用铜来源

清代铸钱的主要原料是铜、铅、锡，特别是铜，在清代钱币中其最低含量也在 50% 以上，故铜的来源对清代地方铸钱工业影响巨大。

有清一代铸钱用铜主要有明代旧遗铜、日本、安南的洋铜、废铜、滇铜及其它地方铜等几大类，其中尤以滇铜和日本洋铜所占的比价为大。

### 1. 明代旧遗铜

清初顺治年间的铜源在很多地区是以明代旧遗黄铜为主的。明代在西北、辽东、宣大、江宁一带留有规模很大的铸币工业，清军占领了这些地区后，接收了这些铸局，并以旧留铜料铸造顺治通宝。

除此之外，大量的明代钱币和古钱也被当作铜料而改铸清钱。

### 2. 洋铜

《续云南通志稿》卷 49，食货志，钱法。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250 页。

《清朝文献通考》卷 17，钱币 5。

清代洋铜的主要来源是日本，少量来自安南。

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后，才改变了铸币用铜全部取之于国内的政策，从此以后，铜料基本取之于外洋，大都来自日本，到康熙五十年，由于日本铜在其国内已不敷己用，开始限制清舶入港，洋铜来华渐少。

康熙六十一年，曾让云贵两广督抚行文安南国王，请准“凡客商办铜务令照常贸易，毋得禁止。”<sup>①</sup>

尽管洋铜来源日少，但有清一代洋铜一直是清代制钱的重要原料。康熙五十八年，清廷委八省督抚办铜，但八省实则均靠江浙二省所办的洋铜。乾隆年间宝武局、宝陕局、宝广局等均曾用洋铜开铸。嘉庆年间，滇铜日少，洋铜更显得重要起来，嘉庆年间江苏、直隶、山西湖北均倚洋铜铸钱。光绪年间更是如此，直隶、湖北、吉林等省均倚洋铜开铸，连在西北内陆的宝巩局也要以洋铜为原料铸钱，后因洋铜未到竟至撤局。

### 3. 废铜

民间和官府的废铜一直是清政府铸钱铜源之一，尤以雍正、咸丰、光绪三朝为最。由于此三朝均处于铜源缺乏之时，搜罗废铜铸钱竟成为官府的任务之一。雍正二年，因缺铜始收废铜铸钱，继则严禁私铸铜器。且议准江西废铜归江南、广西废铜归广东，贵州废铜归湖广，让三省委官收买。<sup>②</sup>

咸丰年间，各地也大规模地收买废铜开铸，台湾此时以废铜炮铸钱<sup>③</sup>。光绪时江南也取此法。

### 4. 滇铜

康熙二十四年，滇铜开采兴盛起来，雍正未年和乾隆年间是滇铜的极盛时代，特别是在乾隆时，滇铜曾供贵州、浙江、江苏、

<sup>①</sup>《广西通志》，卷 178，经政略 28，鼓铸。

<sup>②</sup>《湖南通志》卷 57，食货 3，钱法。

<sup>③</sup>连横：《台湾通史》，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3 页。

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四川外加本省云南及中央户、工二局铸钱用铜，但至嘉庆朝就日见衰落了，道光时已近强弩之末，至咸丰六年，杜文秀起义后，清廷对云南失去控制，铜矿皆废。

#### 5. 其它地方铜

乾隆时除滇铜大盛外，湖南、四川、广西均有铜矿开采，有时也拨这些地区的铜运至他省开铸。如乾隆十五年拨四川铜至陕西铸钱；乾隆十九年因湖南郴州等铜厂产铜，宝南局用不完而运往湖北供铸。但这三省铜矿仅在乾隆一朝有开采，以后就没落无闻了。

新疆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从乾隆年间新疆设局铸钱以来，基本上用的全是本地铜，南疆红钱的原料主要是库车附近的拜城、沙雅两地所产的红铜，北疆宝迪局以迪化南山铜为原料<sup>①</sup>。

### 三、清代地方铸钱工业的五大铸造高潮

清代地方铸钱工业由于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自顺治至光绪年间先后有五大铸造高潮。

#### 1. 第一次高潮

顺治朝铸钱是清代铸钱的第一次高潮，这次高潮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明朝灭亡，新币制确立，需要大量的新朝钱币以供流通；二是清初币制实际上处于摸索阶段，这就造成了顺治五式钱币的产生；三是铸钱可得厚利，刺激了顺治朝地方铸钱工业的发展。

明代末年，币制紊乱，钱法不行。明钱“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摔掷辄破碎。”<sup>②</sup>清入主中原后，首先要解决的经济问题之一，就是要确立新币制，规复货币流通。因而清廷极为重视

<sup>①</sup>《新疆图志》卷 34，食货 3，钱法。

<sup>②</sup>《明史》，食货 5，钱钞。

对明代铸钱工业的接收，从顺治元年始，一大批原明代地方铸局恢复生产，纷纷开铸顺治通宝，仅顺治八年，各省镇设局竟达 14 处，铸钱炉达 1002 座。

顺治年间也正是清廷确立其制钱体制、规定银钱比价的摸索时期。从制钱本身讲，顺治年间确定钱的成分为铜七、铅三，一千文为一串。钱币重量经历了四次变化，一是顺治元年所铸钱重一钱，二年又改为重一钱二分，八年又定为重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又改为重一钱四分。钱币式样也常发生变化，元年至四年铸顺治一式钱，钱背无文，面顺治通宝四字，为光背仿古钱；同时还造二式钱，即在钱背标一汉字局名，如宣府局铸币钱背标宣字；十年又铸三式钱，也称一厘钱，即在钱背除标汉字局名外，又加一厘二字，以表明一千枚钱折银一两；十七年又令宝源、宝泉两局铸钱背标满文宝源、宝泉字样，称为四式；同时省局铸钱在钱背右边标满汉文局名，称为五式。

因银两自宋以来其货币性日益增强，至清时银两在流通领域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顺治年间规定了银一两合钱千文的定例，但因为清代银、钱两者并无实质性的主辅币关系，两者比价实际上随银、钱的供应量而不断地变化，因而清廷的这种硬性规定、对以后的铸钱业及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顺治朝的铸币高潮是和清初铸钱余息极大、获利甚丰密切相关的。当时中央户工两局铸息约当铸钱工本的 21.9% 至 28%，各省镇铸钱局以云南为例，大约为 31.2%<sup>②</sup>。顺治初年清廷接收了明代的铸钱工业，以“旧遗铜铅”开铸，清廷仅拨少量银两给铸局即可开铸，故而获利极大。以明代铸币重心的江宁钱局在清顺

清代档钞《顺治九年四月十八日，户部侍郎赵继鼎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彭泽益：清代采铜铸钱工业的铸息和铜息问题考察，《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 年第 1 辑。

治朝铸币所获余息为例：

顺治三年获息	140600 两
顺治四年获息	333000 两
顺治五年获息	188000 两
顺治六年获息	151000 两
顺治七年获息	116625 两余
顺治八年获息	72103 两余
顺治十年获息	2573 两余
顺治十一年获息	14352 两余

其它地方铸局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正是在以上三种因素的影响下，顺治朝铸币极多，并建立了清代地方铸钱工业的雏形。

## 2. 第二次高潮

康熙年间是清朝地方铸钱工业的第二次铸币高潮期，当时清政府在地方有钱局 30 处，国力强盛的清庭大规模地购买日本等地的洋铜；以支撑国内铸币所需，并积极开采滇铜，以维持国内流通钱币所需，康熙时地方铸局所造钱币均仿顺治五式钱，正面为康熙通宝四汉字，钱背左右为满汉文局名。

## 3. 第三次高潮

乾隆年间是清代地方铸钱工业铸币的第三次高潮，乾隆年间，国力兴盛，云南等地铜矿产量日增，这些都支持了地方铸钱工业的发展。当然对清廷而言，维护钱法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乾隆年间铸钱不仅无余息，而且在有的地方铸局还开始赔钱的情况下，仍然大规模发展地方铸钱工业的原因。乾隆年间 32 个地方铸局所铸钱币均仿顺治四式，即正面为乾隆通宝，钱背左为满文宝字，右为满文局名。

## 4. 第 4 次高潮

清代地方铸局的第四次铸钱高潮发生在咸丰年间。早在嘉庆年间，滇铜日衰，地方铸钱业开始走向衰落。到了道光年间，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泄，再加上以前朝代铸钱量的巨大，使银贵钱贱的现象在国内普遍发生，银一两折钱一千已无法维持，各地铸钱亏损严重。自道光四年福建以银贵钱贱为由上奏停铸后，直隶、山西、陕西、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省也援案奏停。“停铸省份至十一省之多。”<sup>①</sup>道光末年，私钱大兴，清政府想以银代钱，但也失败。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给清廷以沉重的打击，清廷一无财政收入，二来制钱制度又渐危机，银钱比价难以维持。

为了镇压太平军起义，清廷饮鸩止渴，人为地搞通货膨胀，企图以此来搜刮人民，筹集军费。从咸丰四年始，清廷下令各地开铸当千、五百、百、五十、十大钱，后又铸铁钱、铁大钱、铅钱，从而形成了清代地方铸币的第四次高潮。但清廷违反经济规律，以仅能铸十余个小钱的铜料，铸成一枚当千大钱，强迫行使，因而失败得也快。至咸丰七年时，当十以上大钱已在市场上消失，市面仅低价使用当十大钱，这次铸钱高潮给清代币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 5. 第五次高潮

清代地方铸钱业的第五次铸币高潮发生在光绪年间。咸丰大钱失败后，清代制钱已近末途，同治年间一大批地方铸局停铸，到了光绪年间，钱币流通已成问题，当十大钱仅当二行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廷从同治年间就多次下令要恢复制钱，但直到光绪十四年前后，各地才逐渐有所举动，有 26 个地方铸局曾开炉鼓铸，但这次短暂的高潮很快被铜元的兴起，银元的广泛流通而淹没。从此清代的制钱制度彻底失败，新型的机器造币厂开始取代

<sup>①</sup>《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19，钱币 1。

笨重的地方铸钱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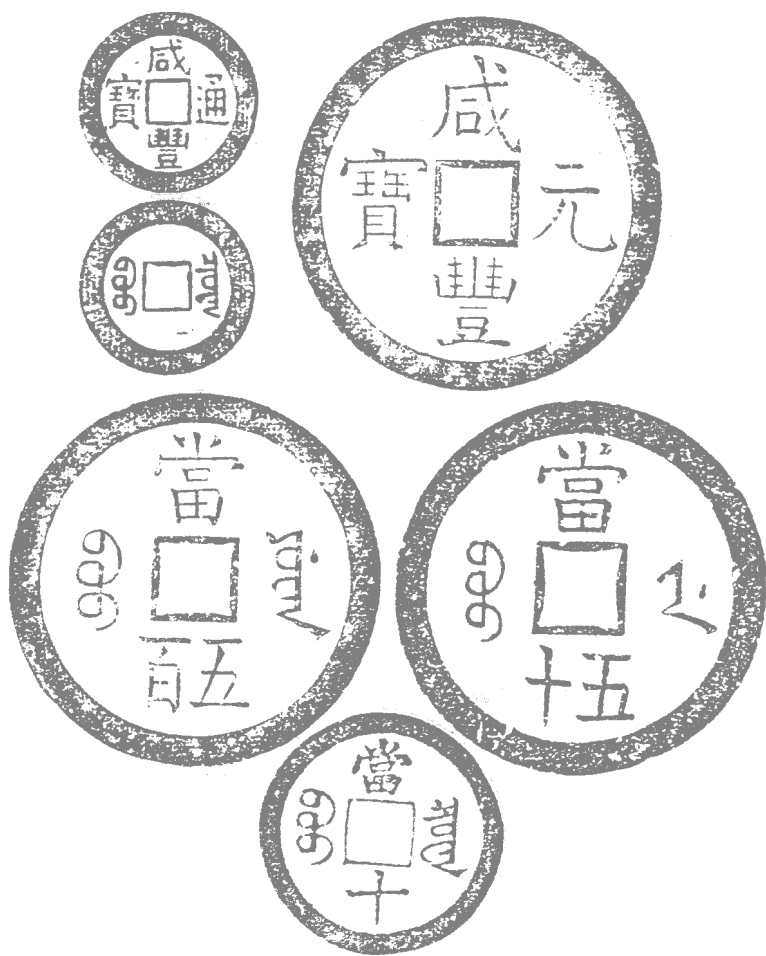


图 1-5 咸丰大钱